

## 周作人饮馔题材散文的文体特征

○ 丁 文<sup>1,2</sup>

(1.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 北京 100089;  
2.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从早年日记到晚年随笔,周作人的饮馔书写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其间经历了数番变化。以饮馔为切入口,可以考察周作人从1930年代至1950年代在散文文体上的创制,为辨析其散文的文体变迁提供一份个案探讨。根据早年日记中的“杂记”体例以及三四十年代之际的国语文“杂记”实验,周作人从自身的写作脉络中提取出独特的路径,并引入古代笔记,开拓了国语文的园地。到了1950年代,在《亦报》随笔中,晚年周作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诸如尺牍、笔谈、杂记等古文的资源,将沟通双方的闲话变成了古雅的独白。这些创制都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定义。

[关键词]周作人;散文;饮馔;“杂记”;《亦报》随笔

### 一、引言

周作人散文多涉饮馔题材,而人们对这一特点也早有关注。然而研究者的注意力,或放在指出其饮馔兴味背后所蕴含的童年、故乡记忆、审美理想,<sup>[1]</sup>或挖掘其所承载的民俗兴趣、怀乡情结,<sup>[2]</sup>或以饮馔为立足点考察周作人与异域文化的关系<sup>[3]</sup>等。面对这一话题,饮馔题材显现出的凡人俗趣、<sup>[4]</sup>乃至周作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闲适文学的代表作家<sup>[5]</sup>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实际上,饮馔散文的闲适姿态很早便招致了世人的误读与忽视。周作人曾谈到人们对于他那些“谈吃茶喝酒的小品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议:一种是说这些文章写得太多,“不是革命的,要不得”;另一种则说这些文章写得太少,“却爱讲那些顾亭林所谓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与文学离得太远。”<sup>[6]</sup>两者比

作者简介:丁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

较,显然第二种意见触及到了知堂散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的苦涩真味,<sup>[7]</sup>看出这些文字在其日常化外表之下蕴藏着思想革命的重任。然而,“离文学太远”的批评却显然未能重视周作人三四十年代在散文文体上的转变与追求。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周作人登上文坛之前,饮馔题材在其早期的日记中便有大量的显现,而作为现代“美文”概念的提倡者,周作人的“美文”在其创作中只占很少份量,且多集中在1920年代,到了三四十年代,他的文章风格发生变化:他有意写作了大量貌似芜杂的“文抄公”文本。进入1950年代,他在《亦报》发表的随笔多涉饮馔题材,并且延续了上一时段的文章风格。由此可见,从早年日记到晚年随笔,周作人的饮馔书写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其间经历了数番变化。本文即以饮馔题材为切入口,以早期日记为起点,考察周作人自1930年代至1950年代在散文文体上的创制,为辨析周作人散文的文体变迁提供一份个案探讨。

## 二、“杂记”:从日记体例到国语文的方向

尽管人们总以“散文”的含混概念统观周作人的文章,但实际上从1920到1940年代,在他的作品中符合现代散文狭义或常规定义的作品很少。或者说,周作人笔下的“散文”比我们现在所认定的文体概念的范畴要宽泛得多。周作人在现代散文中的独创性实验体现在:当他在探寻现代散文书写的独特路径时,自觉将取材于古典笔记中的“杂记”引入散文的疆域,而这一回归式的方案又与他早年日记中的体例脉络相通,或许这并不算巧合:日记中自创新体同样名为“杂记”。<sup>[8]</sup>

在周作人的日记中,“杂记”的功能是独立的景物描写、生动的细节补充、以及为正文画龙点睛等。并且这些“杂记”大都与饮馔相关,上面所举的三则“杂记”便是如此。“杂记”与日记正文的日常记载关系不大,也正因如此,其位置更独立,可以视作日记主人偶而放手尝试的文学创作。早年“杂记”的自创新格,不仅标志着周作人具备了将饮馔微事转化成文学意味浓郁的“杂记”的能力,而且也使他在今后的散文创制中能够得心应手,具备了文体实验的潜能。

20世纪20年代,呼应着自身于1921年引入的西方“美文”观念,周作人发表了一些饮馔主题的著名散文: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喝茶》、《菱角》、《谈酒》等等。然而,即便是这类以叙事、抒情为主的“艺术性”篇章,其写作出发点仍与作者关注的思想议题紧密相联。1924年底,周作人提出了“生活之艺术”的观念,此前此后的谈茶论酒,无疑是将其理论进一步实践化,目的在于找寻古代中国人生活的美好形态,重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即便在这些散文中周作人展现出追忆故乡的灵动笔法,将小孩的歌谣、乡贤的典籍缀入文字,然而行文间总念念不忘思想批判之责,<sup>[9]</sup>表面看来信笔由缰,实则光景纤丝不乱。

然而,对于这种以喝茶谈酒的形式申张“生活之艺术”观念的举措,周作人的态度又相当复杂。他既怀抱“杞天之虑”,担心五四一轮“强硬的礼教反动之

后将引起颓废的风气”，同时他又意识到“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青年的反拨力也未必怎么强盛”，对自己的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缺乏信心。进入三十年代，由于左翼文学的话语压迫，周作人感受到言论空间紧缩，其写作开始出现“向内转”倾向：一方面追忆故乡的文字份量加大，另一方面大量阅读以岁时土俗为主的前人随笔，以书斋阅读开启新的写作方式。

由于时代已然发生变化，作为二十年代“生活之艺术”的提倡者，周作人眼见这一观念有走向“耽溺”一途的倾向，却因为这不过是“乱世的生活法”，因而也无法“激烈”地禁止。<sup>[10]</sup>当他读到展现出20世纪初北京城丰厚温润、充满风趣的生活气息的《一岁货声》时，有意识地将其与1924年《北京的茶食》中对于眼下北京生活干燥粗鄙的反思相衔接，透露出周作人并未放弃其建构现代中国精神生活的思想者重任，只不过方式发生改变：由别具慧眼的典籍梳理代替了此前对于社会命题的直击。

建构方式的转向，使周作人三四十年代之际的文体形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发表了一系列“数百字的笔记小品”，<sup>[11]</sup>他将其称为“看书偶记”，<sup>[12]</sup>其功用为“供杂志补白”。<sup>[13]</sup>从1934年出版的《夜读抄》开始至1940年代出版的散文集，集名多冠以“语录”、<sup>[14]</sup>“笔记”、<sup>[15]</sup>“杂文”等，其文章结构则是“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扯开去”。<sup>[16]</sup>例如，由读《乡言解颐》钩连起小时候故乡酒店的鸡肫豆，<sup>[17]</sup>而回忆起绍兴的夜糖时，于开篇即引用三种典籍。<sup>[18]</sup>

值得注意的是，与这种文体变化同时出现的是，1940年代前后，饮馔微事在周作人的书写中变得地位特殊起来，他曾在早年日记中仅寥寥数语提及的故乡小食，如杨梅、松花团团等，被他愈发珍视、份量也越来越重。<sup>[19]</sup>对此，周作人将其轻描淡写为一种文化考察的独特角度：由点心闲食更易透视“一地方的生活特色”，<sup>[20]</sup>但这显然并非周作人饮馔追忆的重点。而他不肯明言的真正原因，却是因敌国入侵、中原沦陷使其做出附逆的重大选择，再回头已成百年身，其身份、心境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此中是非恩怨或许在心性高傲的知堂看来一说便俗、不足为外人道也，但往事却恰如“轻尘过目，无复留影”，偶然留存下来的旧年饮馔记忆，仿佛“劫灰之余”的幸存品，“过后思量每多佳趣”，“致可珍重”。<sup>[21]</sup>于是，绍兴小儿“不可缺少”的“恩物”夜糖、寻常的印糕，乃至牵牵绊绊钩连忆起的卖糖者的声音，均令其念念难忘，只有追忆者才知晓其中“惊心动魄”的份量。<sup>[22]</sup>1940年周作人突然对金破汴京之后卖炒栗的李和儿旧事大发感慨，当引述完包括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涉及炒栗的笔记片断后，他更抄录自己此前写作的两首绝句以明心迹：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sup>[23]</sup>

几枚小小的炒栗子，竟使甚少直言情感的周作人心绪变得异常复杂：他既自

比失去家园后流转于燕的李和儿,对于自身的人生境遇怀抱无法明言的苦衷;同时又称许陆放翁祈盼王师北定中原的豪志,委婉表达希图收复故园的情思。然而乃翁心愿竟成虚,走向附逆的知堂只能在“陶庵梦忆”般的饮饌追怀中传达这种人多不识的家国之思。像这样致力于介绍家乡饮饌、风物旧事文字,多引用旧籍,其中一部分曾被周作人概括为“桑下文谈”,在其同时期写作中占据了很大比例,虽被贬作“文抄公”文体,但周作人自己对此显然有意为之。在回顾自己四十年写文章的成绩时说:其文章“有部分的可取,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sup>[24]</sup>。

而周作人所欣赏的前人笔记具有这样的标准:“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sup>[25]</sup>用这一标准来观照他这一时段的“笔记”或“杂文”,不难看到他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然而,尽管周作人强调的是笔记的思想内容,但这一时段的写作中,其文体经营中似旧实新的实验性更为引人注目。周作人在检点古代笔记思想成绩的过程中,努力挖掘出这块古河床之下的现代潜流;而当他面对笔记文体本身的价值时,也不乏推陈出新的设计。这批“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的文章固然给人一种“琐屑”之感,但这在周作人看来不成问题,他甚至想要“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sup>[26]</sup>他从古文的边缘文体中,整合出适宜国语文写作的三种文类:“序跋”、“书牋”、“杂记”,<sup>[27]</sup>此前周作人曾分别对前两者进行过有意尝试,结集出版了《苦雨斋序跋文》、《周作人书信》,而到了这一时期,“杂记”则成为他孜孜耕耘的园地。

在解释《药堂语录》中“语录”二字时,周作人提出这里的“语录”并非指古来“门人弟子所记师父日常的言行”的文体,而是指“生平不打诳语”<sup>[28]</sup>的“平常说话”<sup>[29]</sup>。作文虽为小事,但“第一不可失信于自己,心口不一,即是妄语,所当切戒”。<sup>[30]</sup>而“平常说话”则无疑与五四散文所标举的直抒胸臆的原则一脉相承:

我们现在用了国语文做工具,想要写出自己的感想和意见来,其方法是直接对读者说话,或依据前言加以发挥,或记事物……这样便是好的,是正当的方向,我们应当一直的走下去。<sup>[31]</sup>

这种“必须求诚与达”<sup>[32]</sup>的写作宗旨,在周作人看来乃是现代散文“正当的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周作人称得上是现代散文理论家与忠诚实践者,无论何时都没有背弃过五四的方向。尽管“杂记”的形式驳杂:或“依据前言”、或“直接对读者说话”,这种“没有一个宗派”、“上下四旁的乱谈”的“杂家”<sup>[33]</sup>路数,虽在散文谱系中忝列末席,却为这一文类注入了新鲜活水。到了1945年,他在《杂文的路》中,明确提出自己的文章属于“杂文”,而他关于“杂文”的定义显然不同于当时通行的概念:

世间或者别有所谓杂文,定有一种特别的界说,我所说的乃是另外一

类,盖实在是说文体思想很夹杂的,如字的一种杂文章而已。<sup>[34]</sup>

杂文者非正式之古文,其特色在于文章不必正宗,意思不必正统,总以合于情理为准。<sup>[35]</sup>

倘若借用文中引述俞曲园《春在堂杂文》自序中的说法,周作人的这番归纳“虽半是谦词,亦具有自信”。表面看来,他将自己的“杂文”写作归入“文章”与“思想”均“很夹杂”的一类,实际上他又将其纳入了中国历史上的“杂家”、“杂说”、“杂学”的脉络中,与《论衡》、《颜氏家训》等著述一脉相承。至于其间的“夹杂”特色,周作人更予以大力肯定,认为“杂”正是散文“正当的路”:<sup>[36]</sup>“思想”的杂,可以纠偏中国思想定于一尊的毛病;“文章”的杂,则体现了白话文的标准,“以听得懂写得出为标准,并无一定形式”。

虽然周作人多次提醒过读者,其文章思想性大于文学性:“我是不会做所谓纯文学的,我写文章总是有所为”,<sup>[37]</sup>在《杂文的路》中,他对“思想”阐释也远远大于“文章”。然而在他的散文中,思想与文章其实需要合观。例如,如果从形式上看,这些“杂记”采用了“夹杂的语文”:即语言特点“亦文亦白,不文不白”。作为现代白话文的重要实践者,周作人散文中文言比例的加大其实是耐人寻味的,对此他有自己的理念:

写的文章似乎有点改变,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较多了些。其实我的文章写法并没有变,其方法是,意思怎么样写得好就怎么写,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论。假如这里有些古文的成分出现,便是这样来的,与有时有些粗话俗字出现正是同一情形,并不是忽然想起古文来了……即使形式上有近似古文处,其内容却不是普通古文所有。<sup>[38]</sup>

周作人试图强调:这些文章尽管在形式上不无“复古”,但其“思想的分子”却十足“现代”。一方面,这种形式上的实验蕴含着周作人对于古文与语体文关系的思考:古文“本来并不是全要不得的东西”,而语体文“实在是怪寒伦的,洋货未尝不想多用,就生活状况看来还只得利用旧物……假如这样便以为是复古,未免所见太浅”。<sup>[39]</sup>他主张大力借鉴古文的可利用资源,其目的则为了丰富语体文的形式与内涵——周作人看来,相较于引欧化语入白话文,这种建设国语文的方案显然更为便捷。

另一方面,周作人更试图凸显其语体文复古外表下的思想性。他说自己在“看人家的文章常有一种偏见,留意其思想的分子,自己写时也是如此。在人家也不打诳话,这些文章虽然写得不好,都是经过考虑的”。<sup>[40]</sup>而他阅尽旧编,其“所欲窥知”的目的“乃在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然而这种“不废虫鱼风月”的“取材”方向,以及不止一次地强调大量读旧书的目的乃是“只图遮眼”<sup>[41]</sup>。题材本身的闲适外表与其所指涉的思想命题间的差异和缝隙,是常常令读者迷惑的缘由所在。

从早年日记中的“杂记”体例到三四十年代之际的国语文“杂记”实验,周作人从自身的写作脉络中提取出独特的路径,引入古代笔记资源以开拓国语文的

园地。对此,周作人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延伸当年的笔记阅读兴趣:一是将其融入美文中,二是敷衍成后人评价褒贬不一的“文抄公”文体。而表面看来思想性最为暧昧的“饮饌”主题,被周作人有意无意间用作了“美文”与“杂记”两种文体的重要题材:前者似乎更符合现代散文概念;后者则改造自古代笔记,周作人对其的探索得更多,并在其复古外表下融注了更多的思想性。这预示着“杂记”文体的生命力正盛:果然,到了1950年代,新一轮的物换星移过后,周作人以“饮饌”题材展开的时空追忆再次开始了崭新的发挥。

### 三、《亦报》随笔:晚年周作人的“梦溪笔谈”

从1949年11月22日起到1952年3月15日,近三年时间里周作人共在《亦报》上发表了851篇短文,每篇约五百字。联系此前的“杂记”写作,《亦报》随笔的出现可谓对于上一时段写作的承继。而对于这批《亦报》随笔的价值,我们从作者稍后写作的一组“十山笔谈”未刊短文的自述中会得到直接的体认:

近来想写几篇小文章,不一定相连,却也并不一定不相连,因此要给他取一个总名……偶然的记起宋朝以后常用的什么笔谈,觉得这倒是似乎可以使得的一个名字。从《梦溪笔谈》下来那些所谓笔谈,本来也只是笔记的别称,全是杂录的性质,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对象,在千百年后的我们固然可以看,可是作者原是自说自话,目的并不是对着我们说的。<sup>[42]</sup>

这段话有三个地方值得注意:一是作者提示人们,他这一时段的写作貌似松散、实则应整体统观,其内在关联是隐性的;二是在文体方面有古代笔记杂录的特征;三是作者的言说对象值得细究。

首先,我们或许正可以将这批《亦报》随笔,视作晚年周作人的“梦溪笔谈”。其实“笔谈”一词在周作人笔下也非首次出现:1944年他便著有《十堂笔谈小引》,共十则,篇幅略长,收入《立春以前》。纵观这批《亦报》随笔,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枯涩芜杂的风格,与其1920年代的“美文”显然是两种脉络。借用周作人写过“杂记”的《燕京岁时记》跋语来衡量这些作品,似乎正可以用“皆从实录写,事多琐碎,难免有冗杂芜秽之讥”来形容。然而周作人自己又是肯定了这种特质的:“从实录写,事多琐碎两件事,据我看来不但是并无可讥,而且还是最可取的一点……老老实实地举其所知,直直落地地写了出来,在琐碎朴实处自有他的价值和生命。”<sup>[43]</sup>

这些文章的话题表面看来无所不包、质朴琐屑,但散漫中自有深层联系。晚年周作人几乎重抄了他曾于1942年便引述过的清宗室遐龄《醉梦录》中“莫疯子”轶事:其人为山阴人,寓京师三十余年,有诗云“五月杨梅三月笋,为何人不住山阴”。“莫疯子”的境遇与心态与周作人深相契合,难怪令后者不止一次地发出“此意甚可了解,我亦素有此感”<sup>[44]</sup>的慨叹。暮年知堂追忆似水年华,感到无限沧桑。因其身份尴尬,1950年以后周作人直到去世也未能重回故土,回不去的故乡与往昔只能通过笔底的文字一遍遍重温。与三四十年代之际借抄录笔

记中的饮馔片断来表达特殊的故园之思相比,这些形态朴素的随笔则传达了一位永远被放逐在家园之外的离散者的心境。他曾在刚过不惑之年时说过:“过去才经得起我们慢慢地抚摩赏玩,就是要加减一两笔也不要紧”,<sup>[45]</sup>如今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知堂深感昔日不再重来,珍惜往昔的心情有增无减。

对照早年日记中的饮馔片断,会发现此时的随笔不断补描早年日记的留白之处,以饮馔追忆还原出故乡画卷。<sup>[46]</sup>从一天三顿饭<sup>[47]</sup>到下饭鱼介<sup>[48]</sup>,早年的饮馔记载几近空白或一笔带过的部分,到了《亦报》随笔中被拼接成为一幅细腻入微的越郡乡土饮馔志。就连曾被周作人称许为“详记一地方的风物或言语”<sup>[49]</sup>的《越谚》此时也令他颇不满足:认为其“有点电报式”,“须得加以补充”。<sup>[50]</sup>于是,从梅子、夏白桃到罗汉豆,早年日记中的寥寥数字,至《亦报》随笔中成为细节生动的专题:我们不仅能听见延亘过半个世纪后的“青榔头,大梅子”的乡间叫卖;<sup>[51]</sup>而且将两份相隔半个世纪的文本进行参照,还能读到一种对仗工整的互文关系。<sup>[52]</sup>这其中,既有他对积累多年的岁时、风物阅读理念的实践化表达,也体现出他“存录一方风物”以“作志乘之一部分”<sup>[53]</sup>的有意努力。

而周作人正是要以“笔谈”、“杂录”的方式来复原一个过去的世界,即便历经拼凑,这个世界仍然是支离破碎的。表面上看,他对故乡的情感依然像其一贯表述的那样平淡,他于古稀之年仍宣称“我对于故乡是没有多少情分的”;<sup>[54]</sup>而实际上这份怀旧之思正愈转愈浓。<sup>[55]</sup>提到绍兴,他往往笼统称其为“乡下”,然而始终以“住在北方的绍兴人”自居的周作人越来越坚称自己最了解的地方不过是“乡下”,越发透露出周作人对往昔与乡土的珍重。

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周作人曾写了一组回忆鲁迅往事的文章。读者往往通过周作人的文章来了解鲁迅的生平,却少有人在意写下这些回忆文字的人有着与鲁迅几乎完全重合的经历。即便是面对过去,周作人发现留给自己发挥的空间也不多。他一方面只能引述鲁迅的文章,为其补充细节,借此抒发自己的怀乡之念;另一方面则宣布关于故乡,自己可以一谈的“也就只是物产这一方面了,而其中自然以关于吃的为多”,甚至坦言自己所记得的不过是“糕团”。<sup>[56]</sup>他为绍兴香糕“无恙”而高兴,并认为这意味着“乡土风物的传统”<sup>[57]</sup>的保存。这种倍加珍惜饮馔微物的心情,正折射出周作人和他所属的时代已然逝去。当我们看到一位心境苍凉的老翁痴念着童年“烧鹅的味道”,其通过记忆中的味觉试图触摸那个渐行渐远、无从触摸故土的情状令人唏嘘。

其次,《亦报》随笔所规定的五百来字的篇幅,客观上决定了周作人必须向着他自己开创的“杂记”传统回归。既然无法像此前文章那样旁征博引,也不可能充分抒发个人情志,周作人必须在客观谨慎与自我表达之间寻觅一方写作空间,而这些如同旧体诗词般言简意赅、仿佛刚开了头便煞了尾的短文,在篇幅形式上符合了周作人的表达需要。从内容上看,重拾留存脑海半个多世纪的乡味记忆,无疑是较容易获取各方认可的文字。因此《亦报》随笔中的饮馔题材虽种类繁多,从极常见的豆腐到并不常见的盐茶均有囊括,但究其大宗仍以普通常见

食品为主。他认为自己说到底“只是喜欢谈谈乡下吃食而已”，<sup>[58]</sup>并对别人称许他“精通南北之味”感到惶恐。

这样谦卑的姿态，使博览群籍的周作人有意识地节制了三四十年代之际“杂文”中漫引典籍的“掉书袋”写法，将冗长泛滥的剪贴转为点睛式的缀入，即每篇文章引述古籍最多一二种。如讲到山楂的名称，只略提几笔《本草纲目启蒙》与《古今医统》中的相似名称；<sup>[59]</sup>说起以花入馔的植物，仅以《野菜博录》中的草、花、木各部数量作参照；<sup>[60]</sup>甚至以摘引古代笑话集来引起文章主旨的随笔，所引笑话也尽可能压缩精简。<sup>[61]</sup>这种点缀其间的典籍引用部分使其《亦报》随笔比之前的“杂记”更具有古代“杂俎”的情韵，充满一种同时代散文少见的文人雅趣，《亦报》编者称许为“大家”手笔实不为过。<sup>[62]</sup>

而当引述成份被压至最低时，“乡味”记忆的成份也随之增加了。无论文章脉络如何流转，他总在兜一个圈子之后回归到对“乡下吃食”的留恋。即便所写对象为北地食品，他仍能由此及彼：从“爱窝窝”忆起“麻糝”；<sup>[63]</sup>由萨其玛、芙蓉糕想到家乡喜果中的金枣、珑缠豆与白豆包糖；<sup>[64]</sup>夸赞家乡的猪头肉“胜过北方的酱肘子”。<sup>[65]</sup>

此类情形分为两类：一是起笔追溯旧典，如讲玉米时先辨析五谷的种类，<sup>[66]</sup>说白薯时联系到《广志》与《甘薯疏》；<sup>[67]</sup>二是开篇述及中西饮馔交流与对比，讲豆腐时先讲日本的豆腐与西洋没有豆腐，<sup>[68]</sup>说白果时先梳理白果称谓史与传入日本的年代。<sup>[69]</sup>然而无论在纵横两向上如何延展，末了仍回归少时乡间与这些食品的旧因缘，一旦涉笔这个最熟稔的领域，周作人便由一及十，从豆腐说到霉豆腐，再由乡间俗语谈及豆腐炖法，五百字的短章也能令人目不暇接。<sup>[70]</sup>

将旧典缀入与故乡食俗追忆穿插为一体，使周作人必须在叙述风格上尽可能做到流转自如。也正是这种流畅无痕的风格，使得这些风格极简的短章不显单调反倒耐人咀嚼。无论是《糯米食》中的散点贯穿：其涉笔点从北京的糍粑到故乡的麻糍、乡下午糕的制法、中国点心可惜不大利用糯米、糯米制的小食，到现在很难找到同爱好糯米的旧友，<sup>[71]</sup>还是说鲞冻肉先从今年北京的天气不冷<sup>[72]</sup>说起、讲越地冬腌菜的特性、适宜搭配的主食之前先引几句乡友来信，<sup>[73]</sup>谈乡下新年待客的瓜子末了缀以一首小孩的谜语：“一百小烧饼，吃了一百还有二百剩”，<sup>[74]</sup>这些饮馔随笔充斥着一股冲淡悠闲的闲话风，在漫不经心间蕴藏着淡淡怅惘。篇幅虽短但容量却大：乡俗往事、旧籍典故等诸种要素均涵盖其间，而无论笔致如何旁逸斜出，最后总能在漫无边际中兜回眼前。

其三，周作人的“笔谈”对象究竟是谁？与早年日记大量涉笔饮馔相比，这批晚年的报章随笔中涉及饮馔题材的不过 103 篇，仅占 12%，乍一看来比例并不高。从字里行间中我们或许能大致揣度背后的原因：周作人对这一题材的写作心存顾虑，因其主旨“闲适”，不得不有所收敛。

周作人的担忧或许并不为过，与友人相比，他对 1950 年后的政治形势估计甚至是不够充分的。一位爱喝龙井茶的朋友到了华北大学第四部学习时变得不



敢吃茶,担心吃茶会给人一种脱离群众的印象,所以才小心避免,周作人认为其过于“拘谨”。<sup>[75]</sup>然而整体的时代风尚之下,此前喜欢以闲适面目示人的知堂,在为这份新中国最后一份小报写专栏时,不免变得小心翼翼,即便他深知这些文章客观上只是供读者茶余饭后的消遣阅读。不但数量上颇为收敛,发表时变换各种笔名,且内容上也常常靠拢时代话语,如谈豆沙时顺带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史,<sup>[76]</sup>令人很难相信这样生硬的文字出自知堂之手。然而一旦言论空间出现松动,周作人开始有更多发挥。当他读到其他作者认为“《亦报》上有谈谈食物的文字,以为也不必过责”<sup>[77]</sup>的观点之后,便在一个多月内接连发表了10篇饮饌文章。

报章篇幅的限制加上作者的小心顾忌,使得周作人的言说姿态不可能如五四“美文”那样:仿佛“和好友任心闲话”,“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采,浓厚地表现出来。”<sup>[78]</sup>

为了实践这种外国散文中的闲话风,周作人还借鉴了中国古文里的尺牍资源,如他在有意改造的书信文体实验中表现的,促膝谈心式地讲述往往使文章亲切感倍增。但如此轻松愉悦的风格在作为“笔谈”的晚年随笔中是很难找到的。同样是写故乡,时代变了,读者的反应也不复相同。即便《亦报》的阅读群体以南方读者为主,人们在听到水乡绍兴旧事时,也很难有那种“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的真切关心,最多只是如同听白头宫女说玄宗般地了解掌故。既然缺乏理想读者,周作人一方面怅怅于“赞成人”之“不可多得”,<sup>[79]</sup>一方面也只能在当众发言时“自说自话”,其写作目的不再面向读者而是回归本心。这让我们想起了那篇有名的《乌篷船》——1920年代周作人写给自我的一封信。时隔多年,周作人必须在与自我的对话中方能完成其理想言说的方式并未改变,但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前者目的在于为现代散文注入一股西洋散文的闲话风,且有人听;后者因其“说了也无人懂”,<sup>[80]</sup>所以索性回溯到古代笔记中的枯涩苍老的“笔谈”、“杂记”,无人识得、也少有人听。

在《亦报》随笔中,晚年周作人对他在五四时期提出“美文”方向进行了反拨,五四散文中旨在沟通双方的闲话变成了古雅的独白。与此同时,他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诸如尺牍、笔谈、杂记等古文的资源。对于作为五四理论家与散文家的周作人,这有些令人未曾预料,但就其坚持不懈地进行散文文体的实验来看,却又少有人及。

#### 四、结 语

可以看到,在周作人的笔下,从早年的日记,到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散文写作,再到五十年代的《亦报》随笔,饮饌是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题材脉络,而周作人在散文文体方面的努力及其文体变迁的趋势也清晰地体现在这条脉络中。

在周作人的饮饌书写中,早年的日记,特别是自创的“杂记”,潜藏了日后文体创制的潜能;而晚年的《亦报》随笔则在不断补描早年日记留白之处的过程

中,实现了对于文体转型的自觉追求。通过这些写作可以看到,周作人并没有固守1921年的“美文”主张,而是更多地转向了对于“杂记”文体的经营,但思想启蒙与情意寄托却是他始终未忘的主旨。这番文体上的追求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评判的结果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周作人由此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定义。

### 注释:

- [1]李霞:《论周作人的饮食散文》,《延边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第96-98页。
- [2]蒋含璐:《论周作人小品文中的美食情结》,《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22-124页。
- [3][日]鸟谷真由美:《周作人与日本文化——以饮食文化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2期,第39-47页。
- [4]王新惠:《论周作人对饮食文化的传播》,《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51-154页。
- [5]岳力:《闲适与颓废的文学》,《文艺评论》1995年第2期,第80-81页。
- [6]周作人:《两个鬼的文章》,《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44页。本文所采用的周作人散文均出自此本,以下简称《全集》。
- [7][24]周作人:《药味集序》,《全集》第8卷,第626页。
- [8]壬寅三月初四日日记中首次出现,《日记》第327页。
- [9]如《菱角》。
- [10]周作人:《苋菜梗》,《全集》第5卷,第789页。
- [11][13]周作人:《〈桑下丛谈〉小引》,《全集》第8卷,第730页。
- [12]周作人:《〈书房一角〉原序》,《全集》第8卷,第392页。
- [14]如《药堂语录》。
- [15]《药堂杂文》(1944年初版)最初拟名《一簪轩笔记》。见《〈药堂杂文〉序》,《全集》第8卷,第807页。
- [16]周作人:《〈风雨后谈〉序》,《全集》第9卷,第10页。
- [17]周作人:《记盐豆》,《全集》第7卷,第89页。
- [18]周作人:《卖糖》,《全集》第8卷,第31页。
- [19]如《杨梅》,杨梅在其早年日记中仅一笔带过(己亥六月初一日、庚子五月十八日、辛丑五月十五日),此时却被视作“乡味”的典型。“松花团团”也仅在闰三月十二日、庚子四月初四日日记中简单提及,至1940年代则被周作人两次写到。
- [20]周作人:《夜糖》,《全集》第7卷,第33页。
- [21]周作人:《丁巳旧诗》,《全集》第8卷,第323页。
- [22]周作人:《夜糖》,《全集》第8卷,第33页。
- [23]周作人:《炒栗子》,《全集》第8卷,第418页。
- [25]周作人:《谈笔记》,《全集》第7卷,第587页。
- [26]周作人:《书房一角原序》,《全集》第8卷,第393页。
- [27][30][31][32]周作人:《国语文的三类》,《全集》第9卷,第437、440、437、440页。
- [28][41]周作人:《〈药堂语录〉后记》,《全集》第8卷,第560页。
- [29][33][34][35][36]周作人:《〈药堂语录〉序》,《全集》第8卷,第422、422、422、423、423-424页。
- [37]周作人:《〈苦口甘口〉自序》,《全集》第9卷,第358页。
- [38][39][40]周作人:《〈药堂杂文〉序》,《全集》第8卷,第807页。
- [42]周作人:《笔谈的意思》,《全集》第8卷,第45页。
- [43]周作人:《〈燕京岁时记〉》,《全集》第7卷,第31页。

- [44]周作人:《杨梅与笋》,《全集》第10卷,第308页。
- [45]周作人:《〈陶庵梦忆〉序》,《全集》第4卷,第831页。
- [46]周作人以描写“乡下冬天食桌”上常用的“暖锅”来追忆绍兴正月“拜坟岁”习俗;由吃烧鹅来重温那些采杜鹃花的“扫墓时节”;以夏至“照例要吃”的蒲丝饼来追忆祭祖风俗。一顿热气腾腾的暖锅、一碗素净可口的瓜子汤,均使他的笔底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情味。
- [47]周作人:《三顿饭》,《全集》第10卷,第318页。
- [48]周作人:《吃鱼》,《全集》第10卷,第5页。
- [49]周作人:《〈越谚〉跋》,《全集》第10卷,第124页。
- [50]周作人:《鱼腊》,《全集》第10卷,第512页。
- [51]周作人:《谈梅子》,《全集》第10卷,第420页。
- [52]如《日记》中四月初四日:“甘美可口。惜太小,才如郁李”的櫻桃,与晚年《水果与仙丹》:“体格瘦小,面色苍白”(《全集》第10卷,第744页)。
- [53]周作人:《一岁货声》,《全集》第6卷,第225页。
- [54][56]周作人:《绍兴的糕干》,《全集》第12卷,第573页。
- [55]他不止一次地称颂小时候吃过的萝卜炖豆腐(《吃豆腐》,《全集》第9卷,第833页;《萝卜与白薯》,《全集》第10卷,第39页)、念念不忘在南京学堂吃过的腌萝卜鲞(《萝卜与白薯》,《全集》第10卷,第39页;《咬菜根》,《全集》第10卷,第878页)。
- [57]周作人:《进京香糕》,《全集》第10卷,第378页。
- [58]周作人:《烤越鸡》,《全集》第11卷,第139页。
- [59]周作人:《山楂与红果》,《全集》第11卷,第402页。
- [60]周作人:《可吃的花》,《全集》第11卷,第277页。
- [61]周作人:《路旁水果摊》,《全集》第10卷,第298页。
- [62]转引自巫小黎:《〈亦报〉视窗里的周作人》,《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8期,第84页。
- [63]周作人:《爱窝窝》,《全集》第10卷,第322页。
- [64]周作人:《萨其玛》,《全集》第10卷,第640页。
- [65]周作人:《猪头肉》,《全集》第11卷,第107页。
- [66]周作人:《六谷糊》,《全集》第11卷,第362页。
- [67]周作人:《红番薯》,《全集》第10卷,第870页。
- [68][70]周作人:《天下第一的豆腐》,《全集》第11卷,第221页。
- [69]周作人:《吃白果》,《全集》第11卷,第197页。
- [71][79]周作人:《糯米食》,《全集》第11卷,第420页。
- [72]周作人:《鲞冻肉》,《全集》第12卷,第125页。
- [73]周作人:《腌菜》,《全集》第12卷,第134页。
- [74]周作人:《瓜子》,《全集》第10卷,第568页。
- [75]周作人:《吃茶》,《全集》第10卷,第914页。
- [76]周作人:《豆沙》,《全集》第11卷,第85页。
- [77]周作人:《合食与分食》,《全集》第11卷,第78页。
- [78][日]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 [80]周作人:《卖糖》,《全集》第7卷,第33页。

[责任编辑:嘉 耀]